

坚守“人”性,勇担道义

——评西岐报告文学《最棒的农民》

刘 浏

(常熟理工学院 学术期刊编辑中心,江苏 常熟 215500)

摘要:“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是近三十年报告文学重要的题材之一,作品数量丰富,影响深远。《最棒的农民》以一股清流之势,积极且正面地立于报告文学文体流转之中,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温情,叙事、构建精神,勇担道义、彰显文体意义三方面,关注生存于中国农村、更是中国当下最根本、最重要的“人”的问题。

关键词:西岐;《最棒的农民》;“三农”问题;报告文学

中图分类号:I25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8)02-0061-04

“三农”问题报告文学是近三十年来报告文学重要题材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国农民大趋势》《大转移》等,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大上写意》《昆山之路》等,这些作品都是追逐着时代步伐、书写着中国农村改革和生存状况。进入新世纪以后,对“三农”问题的思考,报告文学作品反映得更加深入。何建明在《根本利益》中通过还原中国基层党员梁雨润的故事,将中国最真实的农村、农民问题揭露。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包含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农村经济的深切忧虑,用扎实的数据、详尽的材料,向朱镕基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更是尖锐地揭露了存在于中国农村中诸如贿选、滥用权力,以及农民上访所遭遇的悲惨待遇等敏感问题。与这些作品相同的是,《最棒的农民》关注的也是存在于中国农村,更是中国当下最根本、最重要的“人”的问题——中国人“吃”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李克强在出任国务院总理的第十三天,就风尘仆仆赶去《最棒的农民》所报告的对象——高健浩的庄稼地的原因。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最棒的农民》正如其名,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并且是十分诚恳的正能量,以一股清流之

势,积极且正面地立于报告文学文体流转之中。

一、“人”的文学,“人”的温情

21世纪以来,作为时代文体的报告文学再次焕发生机。无论是题材对象、还是表现方式等方面,都有了扩展和深化。中国报告文学的“裂变与复兴”^[1]揭示了这种文体多元态势和崭新发展趋势,多维多态的“复调与复式”^[2]使报告文学在题旨价值、话语空间和叙事形式等诸多方面显示出相当充分的开放性。意识形态淡化的体现于报告文学作品越来越多地对“人”性的关注,这一淡一浓的转变,昭示着非虚构这一文体文学性的升华,同时给了那些不看好报告文学、甚至断言“濒临死亡”的人重重一击。

“三农”报告文学,是围绕“人”的文学,饱含“人”性。进入新世纪,中国“三农”报告文学报告对象更加细化、专业突出。有着重“退耕还林”,比如李青松的报告文学《共和国:退耕还林》;有关关注农民外出打工的,比如胡传勇的《血泪打工妹》;有写城市农村差距的,比如程宝林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有从土地改革出发,深入思考土地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的,最有代表性的是胡平的《战争状态》。无论是写农村、农业还是农

收稿日期:2018-01-26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6SJD750012)

作者简介:刘浏(1987—),女,江苏宜兴人,编辑,博士,研究方向:非虚构文学及其传播。

民,说到底都是写人。

《最棒的农民》描写了“全国十佳农民”高健浩在“化肥农业盛行,造成土壤板结、地力下降”的大背景下,坚守农民的良心,为子孙后代着想,坚持农民的本分——利用有机肥种田,探索出“种养业—资源化利用农业固体废弃物—优质农产品生产”的绿色循环经济链,创建“龙头公司+系列合作社+家庭农场”的现代农业机制的过程。《最棒的农民》就是写人,写一个叫高健浩的人,他是中国土地上众多农民中的一名;他是一个用脑子种田的农民,他更是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上最自觉、最执着、最踏实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作家西岐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准备工作,长时间的采访是报告文学相较于其他文体而言最辛苦,也是最有魅力的地方所在。和许多写作过“三农”报告文学的作家一样,西岐出身于农民家庭,有过种田劳作的经历,他对于那位“对农业魂牵梦绕、不离不弃、殚精竭虑”的高健浩有着的是理解和敬意。“理解”不难明白,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以作家的身份对社会的观察令西岐选择农业题材、书写农民有据可依,接触和访谈报告对象时提出问题和把握回答准确、到位。“敬意”的产生,则是随着采访的深入渐渐清晰,从一开始偶遇,到心灵深处的大地震,到最终废寝忘食的、带有“使命感”的全盘托出,《最棒的农民》层层破茧,将高健浩这个人物的“人”性一一展现。首先,西岐关注的不仅仅是农业大户高健浩,而是心中有爱的“人”——高健浩。“只要他在家,每天都会为母亲洗脚。每每母亲身体不佳,高健浩总要在母亲的床前打上地铺陪伴始终”^{[3]21},高健浩事母至孝在乡邻间有口皆碑。对待亲人疼爱,对陌生人亦如此。他不但资助过三个孤儿,“人们发现,那时候(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去高健浩家家门口的乞丐特别多”,因为高健浩家的人“和善,有一副菩萨心肠,不放看家狗,不出恶言,不给白眼,盛出来的饭满,给的米多,有时还给鱼肉”^{[3]25}。对大地母亲的爱,高健浩更是深沉。高健浩十三岁在生产队里当社员,十八岁成为大队农技员,二十年后当上了村干部,四十八岁因为“无可奈何的原因”离开农业十年,后来“在他的反复要求下”,“得偿所愿重返农业”。正如高健浩自己所说,“大地的恩,我们报不完;大地的累,我们不能睁眼不见……这债我们必须来还,必须诚诚恳恳地来还。”^{[3]24}如果说,高健浩对大地的感情是歉疚和

报答,那么他对国家的爱则是坚定和隽永的。在《最棒的农民》第一章的开始,作家就突出地引用了高健浩的原话——“你说,你说,水是污浊的,空气是污浊的,吃的是让人不放心的,有老头老太发病摔倒在马路上没有人敢伸出手去搀扶,出了杀人放火的事儿人们都躲得远远的,钱赚得再多又有什么用?……一个牺牲了环境和道德的国家,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吗?毁坏了环境和道德,五十年一百年也不一定能恢复得过来。最要紧的还是要保牢碧水蓝天,保牢正气正义,保牢百姓的安居乐业。”^{[3]25}这番话,没有高谈阔论,没有引经据典,有的就是真真切切、最简单又最直接的道理,出自一个鲜活的“人”的口,一个文化程度并不很高,但是有理想、认死理、肯实干的高健浩之口。西岐将这一章起名为“良心的力量”,再贴切不过。

二、叙事,构建精神

《最棒的农民》整体是顺序的叙事逻辑,其间采用插叙和倒叙相结合的叙事技巧作为补充。“不做蛾子,要做蜜蜂”这一章奠定了整篇文章的叙事基调,这一句的概括也是所报告的对象性格的凝练,同时是高健浩一辈子所做之事的缩影。之后的几章,从“一九九〇年:跟我走,到昆山包田去”到“江苏田娘安徽二〇一四五八农场”,详细讲述了高健浩几十年的农民生涯。起初到昆山包田写到成功后在安徽开设农场,采访了包括高健浩、他的女儿和亲友、老同事和朋友等人,所有的故事作者都力求真实,多方求证,事无巨细的询问。“偏偏要做粪肥翁”“偷粪有罪的岁月”“过去的日子难忘记”“臭粪堆上奏高歌”“白茆山歌唱田娘”“田娘农业的格调”则是围绕高健浩最关心、也是最拿手的肥料事业,详细讲述了他的专业技能和农业思想。

高健浩有很多头衔:江苏田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田娘农场创始人、2015年“全国十佳农民”、苏州市“带头致富”标兵、联合国秘书长特别顾问莫里斯·斯特朗口中解决了世界性难题的“了不起的中国农民”。作家西岐对这个“最棒的农民”形象架构,基于全知的叙事——从2002年从乡镇建管所所长岗位上退下来,高健浩本来可以象所有退居二线的其他干部一样,需要他参谋时就参谋参谋,不需要他参谋时就喝喝茶看看报,访访朋友逛逛街,轻松几年后办理退休手续,然

后,每月领着不算低的养老金,陪陪老伴种种花草,听听苏州评弹、哼哼白茆山歌,烧烧好吃小菜,含饴弄孙,国内国外到处走走,过那逍遥自在的晚年生活。可他从来就是一个不能闲下来的人,他选择了再次创业,而且是象傻瓜一样地、让人瞠目结舌地选择了别人瞧不起、最不可能赚钱的行当——他主动请缨,接管了被人称做“臭摊子”“烫手山芋”的已经领了执照却怎么也寻不来“牵头人”来主持经营的镇畜粪生物处理场,而且还坚决要求公家撤出投资,自己拿出真金白银投资;到高健浩“读万卷书”广泛搜读相关的专业技术书籍,“行万里路”遍访远近的农业院校、农科专家,费尽心机“磕头求拜”请来了20多个灰衣灰裤灰帽子灰袖套的邋里邋遢的驼背老农,以畜禽粪便、作物秸秆、生活污水厂沉淀污泥为主要原料,曝晒脱水(有氧化处理),添加有益微生物,添加锯末秸秆末,翻拌打堆发酵(无氧化处理),粉碎烘干固化包装,半手工半机械化生产颗粒状固体粪肥;再到14年间高健浩经营的江苏田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头吞进畜禽粪便、秸秆等废弃物数百万吨,把污染大包袱变成致富新产业;一头产出有机肥,育出优质大米,带动农民用绿色循环的方式从事农耕生产。田娘公司吸引了48个国家的政经人士前来考察;直到让农民种地也“牛气”的高健浩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佳农民”。田娘公司还先后摘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中国绿色责任贡献奖”“中国十佳绿色责任企业”荣誉称号。高健浩被聘为南京农业大学的特聘教授、特聘研究员,站在了高等学府的讲台上。报告文学的故事完全是基于事实,《最棒的农民》叙事建构高健浩的投身农业的起、承、转、合,顺序叙述之中穿插其他叙事策略,将高健浩这个人物血肉丰满起来。“我就是个农民,一个靠土地吃饭的农民”“我是一个农民,种好我的田是我的本分”“没有什么特别高大、特别伟大、特别了不得的地方,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高健浩的淡定和从容,与其所经历的困难、逆境对比,彼此映衬、相互映衬。读者从客观的故事叙述中,更能感受到高健浩真实的性格和精神,并被其感动和激励。

叙事者的在场以及限知视角的合理运用,是《最棒的农民》表达情意的精妙手段。作家本人自始至终都在文章的叙事之中,西岐的在场作用有时是为了叙事的起承转合,比如开篇就言“同一个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摹写同一位活生生

的人物,居然不觉一点厌烦,不觉一点疲累”,讲述高健浩在安徽办农场的部分时,西岐对自己的参与也采取了直接叙述的方式——“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五日,是周日。我一清早就起床了……我并不知道今天是父亲节。一清早起床,是为了赶赴安徽霍邱。太太在被窝里直起身子,对着窗外的灰黑色唠叨……”^{[3]216}叙事者不回避,而是积极参与叙事,就像是为作品的真实性贴上防伪标签。西岐在叙事中,也从不掩饰自己内心的感受,直抒胸臆:“在我看来,高健浩的一思一想、一言一行,追求的都是良心的固守”^{[3]8}、“在我职业生涯的某一个偶然的时刻,我却遇到了他,听其言,观其行,辨其真伪,我认定,他便是我心中期盼已久、寻觅不着,已认定了不可能再次出现的那种时代的大英雄,现世的圣行者”^{[3]12}……还有时,西岐直接就将他与受访者的对话内容大篇幅的原话搬运。比如,在“偏偏要做粪肥翁”这部分中,作者与高健浩公司的元老之一潘兴元的对话就构成了这一章的全部内容。直接引语是报告文学写作常用的方法,但是像这样以叙事者(也是作者)和另一个与报告对象有直接关系的人进行对谈,并将谈话内容原貌写出(可能经过语言表达上的调整),从而对主人公进行诠释,这样的表达方式不常有,却也是西岐巧思之处。要知道,有些话被报告的对象是不会说的,说出来也不合适。而假如作家直接以全知视角把所有故事都写出来了,又失去了文学作品的韵味。像“在老高退下来之前,老早就已经被好多双眼睛给盯上了,大家都知道老高这个人退下来以后是绝对过不惯那种‘排排坐,吃果果’的无所事事的生活的”^{[3]147},这样的话从潘元兴口中说出来不单饶有趣味,更显得高健浩这个人物真实、有抱负。作家通过采访者的口进行故事叙述,的确比用各种各样联想出来的形容词来描写人物性格更有效果。并且,以此反映出的人物精神更能令读者接受和信服。

三、勇担道义,彰显文体意义

如果说“三农”报告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关注的是减轻农民负担,90年代聚焦城乡差距,那么进入新世纪后第一个十年,报告文学创作则是围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时代主题,涌现出不少佳作,比如反应新生的草根民主遭遇千年官场潜规则之后的种种不适的《灰村纪事》。正如章罗生所说,这一题材创作(“三农”)“不仅有

力推动了中国报告文学的再度繁荣,而且对中国文坛和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4]报告文学向来是所有文学体裁中与时代政治发展联系最紧密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经济与物质成为社会发展的旗帜,作为社会现实的投影——文艺作品必然会有一种“精英疏离于世俗亲近”的趋势。但是,如果是因为新世纪报告文学不如新时期那样有典型的精英气质而否定它、甚至是批判它,那就有失公平了。

批评性并不是《最棒的农民》所要追求的。在整部作品中,几乎没有一处的书写是尖锐的、消极的、沉重的。恰恰相反,西岐笔下的高健浩是积极乐观的,无论是受访者介绍的故事,还是作家的主观叙述,都是温暖感人、热情高昂的。那段最无奈的历史,因为高健浩的态度正面、作家的“实事求是”,使读者观后心中本应生出的惋惜之情荡然无存,留在心间的是敬畏之情。高健浩起初到昆山包田签的是四年合同,“但高书记只来了两年半,后头的一年半里只悄悄地来”。原因是,由于包田他在村支书改选中落选了,可以说是“被迫”中断务农生涯的。对于这一段过往,高健浩的女儿也是直到陪同西岐采访他人,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其中原委。高健浩本人确实始终云淡风轻,对那件事也没有丝毫抱怨,反而是放心不下那块田和当初与他一起去昆山的十七人有因此遭受损失。难怪旁观的赵水根说“这种高风亮节,这种精神风貌,就这样活生生地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那会儿,社林跟我说了,我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高书记这个人,世间少有,值得所有人学习”^{[3]93}。

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二个十年,中央对农业农村政策的表述从之前的“支农”到“支农惠农”到“强农惠农”再到如今的“强农惠农富农”,可以看出,国家对农业的重视提升到了发展战略的第一位置。在十八大会议报告中特别强调,“解决好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牢固树立‘重中之重’的战略思想,对于做好新阶段‘三农’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小康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意义”。如今的高健浩,头顶着“农业部全国粮食生产大户标兵”“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国绿色责任突出贡献者”“全国十佳农民”“江苏省劳动模范”“受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高度肯定的第一位家庭农场主”“苏州市带头致富标兵”等等头衔,但西岐“条件性地认同高健浩是‘影响未来中国走向百位当代人物’”,他将高健浩的贡献归纳为四点——较好地解决了农业面临污染、食品安全、粮食自给、农户收入不稳定等问题。这四点涵盖了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问题要解决的方面,不仅处理了“吃饱”、也处理了“吃好”的问题,不愧为当下国家“三农”发展的榜样。

《最棒的农民》入选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主办的2016年度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榜单,这是由读者网络投票评选出的年度读书。需要说明的是,这50种图书包括文化类10种,文学类15种,生活与科普类10种,少儿类15种;体裁涵盖小说、诗词、散文、传记文学、纪实文学等。《最棒的农民》从许多优秀作品中脱颖而出,反映出大众对“三农”的热烈关注,也体现了对报告文学这类非虚构文学体裁的认可和喜欢。通过对单一事件或人物的书写来关照社会,正是非虚构文学的特性之一,报告文学也正是具有鲜明社会意识的非虚构文体。《最棒的农民》向“人学”回归,表现出文学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被化解的迹象,作家在感性与客观社会及文学表达用意的理性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彰显高度融合文史哲的理性精神,受到大众喜爱、赢得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 [1] 王晖. 裂变与复兴: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回眸[J]. 南方文坛, 2012(1): 105-108.
- [2] 丁晓原. “复调”与“复式”:新世纪十年报告文学观察[J]. 文艺争鸣, 2011(7): 37-45.
- [3] 西岐. 最棒的农民高健浩[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 [4] 章罗生. 聚焦“三农”:新世纪报告文学的题材拓展[J]. 甘肃社会科学, 2006(2): 21-24.